



新浪微博 @今日烟台

腾讯微博 @今日烟台



烟台微信圈子

微博烟台早知道

名嘴说事

别觉得中国孩子辛苦,美国孩子整天玩儿。事实上,美国的初中生,许多每天就睡7个小时。到了高中,熬夜到一两点不稀奇。差学校的孩子整天玩儿,好学校的学生玩儿不起。CNN最近发表评论,讨论“日程过度的孩子”。别觉得出去就没压力。有志气的孩子都有压力,问题是什么样的压力。

——薛涌(作家)

回到家乡东港,一年之间,这里又建起了许多新的住宅小区。八年不到,滨海的滩涂已经全被开发,变成工厂、酒店和住宅,怀念原来的环境啊!这次有一个新的发现:住宅小区预留的商铺,九成以上是空置的,表明当初是高估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目下全国都在城镇化,但愿能规划得更好,不至于形成浪费。

——翟德芳(出版人)

嬉笑怒骂

新闻:一卧铺车在荆州长江大桥坠桥,14死8伤。图片显示,该大桥是双层防护栏(夹有人行道),我们疑惑,大巴车坠桥是冲击力太大?还是护栏之故?近日,该大桥还曝出多处修补裂痕,官方只是称“没问题”。一座历时4年半,总投资近14亿的大桥,除去“安全”,难道不需“信任”来护航吗?(央视)

点评:所谓裂痕,其实是模仿窠变的装饰,与质量无关。

新闻:被打捞上岸的男尸身穿棕色外套,戴白色手套,手脚被绑缚,身上还拴着一块窠井盖。围观市民纷纷猜测这是一起被害案件。但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等措施,现已排除他杀可能,确定死者系溺水自杀身亡。(新民网)

点评:以前湖北一位官员身中11刀也被认定为自杀。

新闻:在这之前的两个月里,包括河北省在内的京津冀区域出现了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持续空气污染事件,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监测数据统计,今年1月份京津冀共发生5次强霾污染。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有关专家称,华北地区已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新京报)

点评:经济发展最快不该以污染最严重为代价。

新闻:3月12日,郑州一网友上传了一段视频:在挤满乘客的公交车上,一年轻女孩因未给一名60岁左右的老人让座,被其拽住头发暴打,后被其他乘客分开。视频上传后引发了网友的大讨论。当晚,郑州公交三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证实此事因女孩未让座引发。(大河报)

点评:为老不尊,为少不敬。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招聘公益活动受到很多求职人员和公司企业的关注,不少求职人员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工作,众多用工企业也如愿以偿。还有一些人并没有跻身求职大军里,而是选择了自主创业。大学生开煎饼店、卖猪肉放到10年前会被人说成不思进取,而现在的社会舆论则宽容了很多。事实也证明,三百六十行,确实行行出状元。

肯定“卖饼哥”体现社会进步

毛旭松

大学生关晓冠毕业之后,嫌上班工资低创业开饼店,生意火爆,一天能赚600多元,每月利润超过万元。父母得知消息后却极力反对,称“好不容易把儿子供成了大学生,怎么能和我一样做街头小买卖呢?”

退回10年前,北大毕业生陆步轩长安街卖肉为生的新闻曾经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一名名牌大学毕业生沦落到街头卖肉为生的地步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言语间透露着对陆步轩不思进取的惋惜。

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业,干着“不该是大学毕业生干的”工作。而现在的社会舆论则不再是嘲讽,更多的是肯定。10年的时间,民众对大学生择业有了新的认识,给予了足够的宽容。这固然跟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多元化发展和民众思想觉悟的提升。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抱着过去的观念,比如关晓冠的父母对儿子开饼店很不满意,认为读大学就是为了端铁饭碗,接受大学教育就是为了当干部。其实,大学生这个概念被他们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大学生是一群高素质人才,应该有着更高的追求和涵养,一旦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仿佛就是离经叛道。

实际上,陆步轩用事实回击了当初很多人的质疑,他不仅开了两家店卖肉,年收入过20万元,而且还出书开办了“屠夫学校”,希望“培养出来的都是通晓整个产业流程的高素质屠夫”。关晓冠也不再拿着2000元微薄的工资,如今生意是越来越红火。复旦大学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舆论左右着大学生的择业观。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大学生对行业未来发展的选择与他们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预期收入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他们更看重的是未来的发展空间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利益群体的重新分化,那种安稳守成的择业观被挑战的、自我创新的风险择业观所取代。社会舆论给予大学生宽容的空间,会让更多大学生摒弃随大流的想法,从而真正从事自己愿意干的职业。

当然,通过改变社会舆论来影响大学生的择业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和学校保证健康的舆论导向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些基本的择业价值观,比如“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必须坚持,不仅要宣传,而且要创造好的条件,真正做到行行出状元,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对很多行业和工作存在偏见的现状。

就业问题本质上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大学毕业生应当有做任何工作的思想准备,社会舆论要给大学生更多的宽容、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传统“就业”的社会观念。

新闻聚焦

烟草院士

新闻回放: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争议一直不断。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鹤鹤近日称,依据章程,工程院不会主动撤销“烟草院士”谢剑平资格。不过,工程院正在对谢剑平做劝退工作,但对方不接受。

《成都商报》评:岿然不动的“烟草院士”像一个代表烟草产业与控烟事业博弈的符号。一方面,是中国控烟事业进展缓慢。至今无一部国家级的控烟立法不说,国家烟草局还进了国务院的“控烟领导小组”。另一方面,则是烟草产业欣欣向荣,过去十年里,我国卷烟量一直保持着年均3.5%的增速,卷烟营业收入始终保持着年均15%的增长,烟草行业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强势牛气的烟草行业,为谢剑平当选院士有力撑腰。因为我国对烟草科研成果的评价存在以经济效益为主要标准的倾向,当初,有工程院院士给他投票的理由之一居然是“烟草行业是我国的纳税大户,烟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至于他1992年享受国家级的“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荣获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就都不难理解了。

《新京报》评:院士的利益化

和院士评审中的功利化、行政化问题,近年来饱受社会舆论质疑。工程院本应该把处理“烟草院士”问题,当作推进去利益化改革的契机。但是它在“烟草院士”事件中迄今为止的表现,却是令人失望的。

从启动复议程序讲,工程院已经意识到“烟草院士”的存在会影响“工程院声誉和全国控烟工作大局”。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允许其继续存在,继续成为舆论批评的靶心?为自身声誉,也为给民众一个说法,工程院在此事件中都应有更积极主动的作为,不能止于让其本人提出辞呈。

最长机构名

新闻回放: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即将合并,全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长达14字的名称引发了网民的吐槽,殊不知,14字并不是最长的政府机构名称,网民纷纷寻找“没有最长只有更长”的机构称谓,数个称谓超过40字的机构浮出水面。

《晶报》评:之所以出现形形色色、蔚为奇观的超长机构名称,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么是进行前期调研,没有认真听取多方意见就急急忙忙发布;要么是固守传统思维,将机构名称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觉得这样简单省事;要么是抱着谁也不得罪的心理,以免有厚此薄彼之嫌,干脆大家排排坐,吃果果,皆大欢喜。有网友据此发挥,按照这样的逻辑,文化部是否应

改名为“歌舞绘画戏剧戏曲杂技博物馆书法等等部”?

不管是什么原因,一个共同点是这里面看不到公共利益,也看不到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我们过去有刑部、户部、礼部、兵部,何等言简意赅,为何现在反倒失去了类似的概括能力?中央大倡行改文风,显然,给政府机关起名也要“改文风”。有时候形式决定内容,犹如空话和套话使一些人失去了观察新问题,吸收新思想的天赋能力一样。正如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郗书林所说,老祖宗有句话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机构如果连名字都起不好,冗长臃肿,辞不达意,叫公众如何对其职责执行力产生足够的信任?

《京华时报》评:整合乃至化合,是大势,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磨合。保留如此长的机构名称,表明了这样一种过程心态,也表明随着文化整合的加速,它的长名不会保留太久,必将在未来文化改革的进程中归为历史。相比之下,人们不会过多地为一个机构长名的叫法而时间更有期待。

的确,两大文化类机构的整合,是媒体行业发展的必然。从报刊、出版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到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它们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使得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出现交叉与空白,多头管理与效率低下等共存现象。因此,先从管理机制上理顺,实现管理机构的整合,乃是当务之急。

浮光掠影

二月二 龙抬头



- 秋心:二月二龙抬头,今天你剃头了吗?
蔡虎爱乐活:二月二,剃剃头,剃掉烦恼和忧愁,欢乐多,幸福多,今年定有好兆头。
爱斯基博:正好孩子满三个月,给剃了个秃瓢,显然俺娃对新发型很不满意。
陈豪:二月二,龙抬头,头大下雨不用愁。
PinkSwan:忍了两个星期的平刘海顺利转型成斜刘海了。
Kelly哪妈:问儿子要剪什么发型,他说我要剪一个龙抬头的发型。
独自溜达: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怎么也得去剪上几刀!于是乎,在对称的鬓角上也来了三条斜线。

媒体观察

告别“中国式求人”,该做些什么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的一个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员和民众的共鸣。他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也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周新生委员所说的“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人情这种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资源分配、纠纷处理以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国式求人”这个草根话题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身上,或者给民众造成麻烦,或者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

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即

便排除以权谋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让人受不了。有企业的代表就说,公司为开展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这让视时间为生命的企业,能不去“求人”吗?

好在,正提请人大审议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此已有所“回应”,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这也就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

“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人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完全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可能的刁难,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原载于《新京报》,有删节)